

#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 ICS BULLETIN

二〇一五年 第四期

## 陳韜文教授訪談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歷史與發展

訪問日期：2015年10月9日

地點：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會議室

受訪人：陳韜文教授（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及新聞傳播學榮休教授、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

訪問者：黎志添教授（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及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筆錄：徐艷蓮（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〇一五年十月九日，《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封面文章欄目邀得陳韜文教授接受訪問。陳韜文教授與訪問人黎志添教授回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歷史與發展，談到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合作，並總結自己的研究歷程。以下為訪談摘錄。

#### 一、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歷史

陳韜文教授首先回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歷史。中心創辦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前一陣子還舉辦50週年紀念國際會議。1963年，西方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在香港設立了「大學服務中心」。它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專為海外到香港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直到中國對外開放以前，中心成為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大本營。在冷戰時期，西方學者要了解當代中國只能間接通過香港獲取信息和資料，在為西方學者服務的過程中，中心積累了大量豐富的中國研究資料。1988年「大學服務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並於1993年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繼續為從事中國

研究的學者提供無償服務，服務的對象從海外學者擴展到中國大陸及其它大中華地區的學者。多年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也舉辦不少學術座談會、公開講座、會議、工作坊、培訓班等活動，為世界學者及本地師生提供學術交流的平台，增進全球從事中國研究學者的對話。中心這麼多年來為中國研究者所提供的服務已為它贏取了中國研究的「麥加」的美譽。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主要優勢在於中心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其使用之方便為海內外學者稱道，其中包括：1) 五十年代初至今的中國省市級及全國性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出版的各種資料；2) 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類年鑒、統計資料；3) 省、市、縣、鄉鎮級地方誌，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稅、教育、水利等專門誌。這些都是非常完整而有特色的收藏。另外還有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資料，包括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以專題為基礎收集散失在各地的一手材料，並加以電子化儲存，這部分的收藏也是很著名。除此之外，中心更將原有的資料數據化處理，建立了中國發展資料庫（縣級）。該數據庫與地理信息系統兼容，可進行大規模的量化研究和分析，以便觀察中國地方發展的動態，為世界各地從事中國發展的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人士提供多角度的研究資料。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始終圍繞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服務的宗旨，不僅提供完整而豐富的原始資料，更對原有資源進行電子化整理建立大型數據庫供研究者使用。

陳韜文教授總結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兩個首要功能，其一是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圖書及電子檔案等參考資料，這屬於文獻資料服務功能；其二是以舉辦研討會及邀請訪問學者等形式，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聚集及交流的平台，這是聯接匯聚功能。

## 二、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

另外，自2004年起，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於每年1月舉辦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2007年起與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合辦），讓當代中國學者發表論文及研討，並為與會者於會期前後到中心從事文獻研究提供協助。另邀請中國研究的資深學者擔任主題演講嘉賓，分享其看法及研究成果。研討班旨在促進當代中國研究及中外年青學者結識、交流；提升中國研究博士學生的能力，拓展其視野。第十二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訂於2016年1月6至9日舉辦。陳教授介紹，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已經成為中國研究領域著名的研究生研討班，許多從事中國研究的出色學者都曾是研討班的學員。

## 三、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未來發展計劃

陳教授介紹，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未來發展包括積極推動民間口述歷史及中國記錄片的研究。中心收集中國民間紀錄片及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這些民間歷史資料，希望能夠聚集相關領域的學者及熱心人士，推動民間歷史及中國紀錄片運動，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及興趣。

除提供文獻及學者交流平台外，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設定具體的中國研究議題上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中心以原有的館藏資料優勢為基礎，設定有特色的議題，例如政治運動，縣志研究等。因為有強有力的資源為基礎，這些議題的設定能夠吸引相關領域的學者參與，對於促進相關主題的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動力。陳教授指出，在未來，中心也希望以議題為考慮，吸引更多的國際學者前來訪問及交流，進一步推動相關議題的研究。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慶祝五十週年的時候，中心特別設定以意識形態、權力與中國轉型（Ideology, power and transition in China）為議題的國際研討會，邀請中國研究領域中的資深學者參加。這次國際會議的文章將以特刊的形式發表在《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中心希望藉此進一步推動世界中國研究，並提升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在學界的影響力。

談到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未來的發展，陳教授指出，中心正在考慮如何保存文獻資料及使其更加容易被使用等問題。中心將與圖書館進行合作，將文獻資料數據化。另外，在圖書館藏方面，因為目前大學圖書館和不同科系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圖書已有自己的關注和長處，中心無需再另外訂購。在未來中心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到對地方報告以及縣志等資料的收集，繼續發揮中心的館藏特色。除此以外，中國發展資料庫在未來的中國研究中很有潛力，中心會繼續更新擴充。陳教授希望，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能繼續保持中心本身館藏的獨特性，並加以延伸及擴充。在建立學界交流平台方面，中心計劃舉辦更多研討會，會議和工作坊，促進中國研究領域學人更緊密的交流。

陳教授期望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未來能夠爭取到更多的資源，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他指出，香港在中國研究上擁有地理及文化優勢，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目前中國研究的力量相對分散，對於如何促進從事中國研究群體的交往，香港作為中國研究的重鎮，應當肩負起更多責任。陳教授介紹，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目前正在有意識地發展與其它機構或相關單位的合作，例如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總部設在香港，並在香港出版期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目前正在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合作，2015年11月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將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合辦研討會。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中心希望可以進一步擴展這樣的合作。除此以外，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中文大學的相關部門也有合作。陳教授指出，相對而言，社群合作意識在國外比較強，我們也應該有所加強。

#### 四、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中國文化研究所

2013年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正式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務求於中國研究領域上與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單位有更緊密的合作。陳教授指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偏向社會科學取向的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則偏向人文科學取向的研究，這兩個研究取向的差別在於社科研究偏重客觀性及因果關係，人文研究則強調理解的深刻性及獨特性。但這兩個學科在當代的發展越來越呈現交叉與重疊的趨勢，從而造就學科間合作的可能。此外，在具體的研究課題上，兩者

也有重疊之處，如當代中國的研究很難與傳統中國完全脫離，忽略歷史文化的延續關係。這些趨勢導致社科研究與人文研究有多種互補合作的可能。但在現代學科的嚴格區分下，具體如何去實現合作及促進有效的對話交流面臨不少困難。陳教授提到明年將是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計劃就此議題舉辦會議，這一議題便可以涉及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研究，但如何促進兩種學科之間的有效對話，這是一個我們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陳教授指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加入中國文化研究所後，可以擴充中國研究學者的人文視野，擴展合作的可能，進一步擴大中國研究的社群。例如，在會議的舉辦上，吸納人文科學的學者參與便是一個可行的辦法。陳教授也希望，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能夠得到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支持，提升中心在中文大學的影響力，為中心爭取到更多的資源。

## 五、個人研究近況

陳教授最後介紹他的個人研究。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政治傳播、國際傳播和新聞研究，是三者交叉的領域。在地域上，陳教授的研究大多與香港的政治傳播有關係，探究香港的回歸過程乃至回歸之後，政治權力結構與傳媒系統的互動關係。由此擴展至考察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新媒體興起的關係，社會動員的新模式。例如，從七一遊行到佔領運動，其中涉及的新媒體運用與大眾媒體及社會動員的關係，也是以香港社會為基礎。另外，陳教授也很關注集體回憶的興衰問題。如八九民運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回憶一般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淡化，但是六四事件在香港的集體回憶中淡化的程度很小，在新一代的集體回憶繼續傳承，這一過程是透過怎樣的機制和條件得以傳承下來？這是對集體回憶的社會學探究。陳教授亦進行比較性的研究，例如考察中港台新聞工作者的不同取向，世界不同媒體如何報導同一新聞事件等。

談到自身研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陳教授指出，他的研究對象大部分是華人社會的傳播現象，也涉及中國文化層面，因為社會文化本身就是影響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因素。陳教授指出，他的研究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國大陸文化如何與港台文化的互動，中國大陸文化如何在港台因應環境而發生變化和發展等。在陳教授的研究中，中國文化不是中國傳統殿堂、經典文本文化，更多是體現一種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專業理念好像新聞觀念等。對陳教授來說，社會科學領域擴展了文化研究的對象，文化不僅限於經典文本或是知識分子的文化，而是擴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所折射的中國大眾文化、社群文化、日常生活文化。他認為這些文化很值得我們研究，從中可以豐富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揭示中國文化的多層次及多元性面貌。

#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之研究

## ——以順德本為中心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今年2015年乙未，是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西嶽華山廟碑誕生1850週年，又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該碑毀於地震460週年，還是該碑四大拓本之一「順德本」的主人李文田逝世120週年，歷史與文物之運會際遇，奇巧如斯，謹撰一小文以誌之，所謂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也。本文第一節簡介華山碑之來歷，和該碑三大拓本長垣、華陰、四明本之流傳；第二節在林業強先生多年研究的基礎上，<sup>1</sup> 探討順德本的來龍去脈；第三節對該拓本內孫星衍跋語的年份，作一考證與推測。

### 一、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及其三大拓本

西嶽華山廟碑，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立於華山腳下之華陰縣，倡其事者為弘農郡太守袁逢，成其事者為袁逢的後任孫璆。作為天下五嶽的西嶽華山，在漢朝的國家祭祀理論內佔重要位置，所以碑文一開始就引述《周禮·職方氏》、《春秋傳》、《易》、《祀典》、《禮記》來論證西嶽華山的正統與祭祀華山的重要，並指出漢朝歷代君王均有定期祭祀華山的政策。東漢桓帝延熹四年七月甲子（161年8月16日），弘農郡太守袁逢鑿於華山廟內過去「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就命人刻立新碑，但即將完事之際，袁逢被調遷為京兆尹，此事暫停，直至孫璆接任弘農郡太守，才正式完成立碑之事，時為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165年5月27日）。<sup>2</sup>

袁逢、孫璆所立的西嶽華山廟碑面世於165年，時東漢因戚宦之爭、黨錮之禍而朝綱敗壞，此後三十年間，黃巾作亂，董卓入京，漢室名存實亡。此碑則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的興亡滄桑而默默無聞，直至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才引起注意。徐浩《古蹟記》對此碑寫了短短一句按語：「蔡邕石經、西岳等數碑，並為曠絕。建中四年三月」。<sup>3</sup> 又復二百多

1 林業強編著，《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

2 以上內容及引文，俱出《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拓本真跡影印部分是沒有頁碼的。

3 轉引自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文選樓叢書本，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後，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歐陽修在其《集古錄》對此碑作了一番歷史考證，<sup>4</sup>此碑才逐漸廣為人知，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就收錄了從徐浩到阮元本人凡23人25則題記。<sup>5</sup>

顧炎武指出，這塊西嶽華山廟碑毀於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地震。<sup>6</sup>此後，該碑拓本日益珍貴，清中葉以來碑學流行，華山碑以其年代之久遠、書法之雄勁而聲價日高，逐漸形成四大拓本之目。其中，有關順德本的問題，本文將於第二節詳細探討，茲根據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諸家記載，對長垣本、華陰本、四明本之來歷略作交代如下。

**華陰本** 又稱關中本，為朱筠所有，故朱筠記載詳盡：該拓本為宋末拓本。明萬曆（1573-1620）中，為陝西的東肇商（雲駒）、東蔭商（雲雛）兄弟所藏。東氏兄弟轉送福建武平籍的郭宗昌，郭對此高度重視，特於明天啟元年大年初四（1621年1月25日）廣邀親朋，召開欣賞拓本大會，「一時名流跋者十餘人」。步入清朝，此拓本為陝西華陰籍的王宏撰（無異）所有，後流入江南徽州府歙縣何氏手中，再為該縣教諭黃文蓮（星槎）得之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年後，乾隆癸巳（1773），黃將之送給朱筠。<sup>7</sup>阮元記載與朱筠不同之處，在於此拓本王宏撰之後、黃文蓮之前的經歷。據阮元，康熙年間，此拓本從王宏撰流入淮安張劭（力臣）之手，又於康熙甲申（1704）出現在揚州周儀（確齋）家中，乾隆初年，此拓本為上海凌如煥所有，凌與黃文蓮是鄉親，黃文蓮於是得此拓本，時為乾隆三十一年。<sup>8</sup>王昶記載又略有不同，他說此拓本在郭宗昌之後，曾為商邱侯氏所有，而不提王宏撰，後來凌如煥任職河南學政期間，得此拓本，凌與黃文蓮既是同鄉又是姻親，於是贈給黃文蓮云。<sup>9</sup>朱、阮、王三人記載之異同，甚為有趣，但對本文而言並不重要，容他日另文探討。

卷1，頁1。又，本文所有西元紀元日期之轉換，俱得自中央研究院兩千年中西曆轉換軟件：<http://sinocal.sinica.edu.tw/>

4 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

5 俱載《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具體包括：(1)徐浩《古蹟記》，(2)歐陽修《集古錄》，(3)歐陽棐《集古錄目》，(4)趙明誠《金石錄》，(5)洪适《隸釋》，(6)董道《書跋》，(7)吳曾《能改齋漫錄》，(8)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9)屠隆《考槃餘事》，(10)趙崑《石墨鐫華》，(11)顧炎武《金石文字記》，(12)馮景《解春集文鈔》，(13)顧藹吉《隸辨》，(14)吳玉搢《金石存》，(15)全祖望《鮚埼亭集》，(16)翁方綱《兩漢金石記》，(17)錢大昕《潛學堂文集》，(18)朱筠《笥河文集》，(19)畢沅《關中金石記》，(20)桂馥《跋》，(21)武億《授堂金石跋》，(22)武億《金石遺文錄》，(23)王昶《金石萃編》，(24)阮元《擘經室文集》〈華嶽碑二跋〉。

6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4。但趙崑《石墨鐫華》對華山廟碑之毀滅有另一說法：「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先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3。林業強先生詳細分析顧、趙及諸家之說，認為華山廟碑因嘉靖三十四年地震而仆倒敗壞在先，又因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十一年（1562）兩次重修華山廟而被敲碎成為建築材料，「這是漢延熹西嶽廟碑的最後命運」。見其《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8。

7 以上內容及引文俱出朱筠《笥河文集》，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0。另外，錢大昕《潛學堂文集》亦引述黃文蓮，謂此拓本「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於歙而得之」，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9。

8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

9 王昶，《金石萃編》，轉引自《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

**長垣本** 此拓本的歷史相對簡單。據阮元，此拓本於明代為河南長垣籍的王鵬沖（文蓀）所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此拓本歸於河南商邱籍的宋犖（漫堂），繼而由宋之同鄉陳氏所有。嘉慶二年（1797），此拓本進入成親王的詒晉齋中。<sup>10</sup>

**四明本** 此拓本最為獨特，因為是迄今唯一「單紙未禪，整碑完全」的拓本，而非剪裝成冊的拓本，為阮元所有，故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記述甚為詳盡：該拓本明朝時是寧波豐熙的萬卷樓的藏品；入清之後，落到鄞縣全祖望手上；再歸范氏天一閣，可見一直沒有離開過寧波府；乾隆年間，范氏請錢大昕兒子錢東壁編纂天一閣金石目錄，事成之後，范氏為表謝意，就把這拓本送給錢東壁；嘉慶十年（1805），錢氏將此拓本典當予印氏；「（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歸于余」。<sup>11</sup> 但是，阮元於同一書稍後又說：「（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歸于余」。<sup>12</sup> 究竟阮元是在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年還是十三年戊辰1808年得到四明本？這個問題關係到本文下一節考證孫星衍為順德本題跋之年份，下文一併考證。

從上文之簡略介紹可知，該三拓本均分別以其早期藏家之地望命名，嘉慶年間，華陰本歸於大興朱筠、長垣本歸於成親王，四明本歸於揚州阮元。但順德本卻以其後期藏家之地望即李文田籍貫所在之廣東順德命名，為何如此？這無足深究，更重要的是順德本的來龍去脈及其中孫星衍題跋年份的問題。

## 二、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

對於順德本的研究，當然首推林業強先生編著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此書出版於1999年，除將順德本原書作精美影印外，更收錄了林先生自1977年以來針對順德本而撰寫的研究論著四篇。<sup>13</sup> 有關華山廟碑順德本的重大問題，例如金農與順德本之糾葛、金農雙鈎本所造成的誤會與附會、四拓本缺泐之比較、順德本捶拓年份之早於三拓本、順德本題跋鈐印之分析等等，林先生累積數十年「伏虎」功力，<sup>14</sup> 都已出深入之分析，得出紮實之結論。本文這一節簡要介紹順德本的來歷，下一節對順德本內孫星衍題跋年份，作一考證推測，庶幾拾遺補闕於林先生研究之末尾云。

10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5-16。

11 以上內容及引文引文俱出《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6。

12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

13 分別是：(1)〈華山廟碑四本逐字剪裝比較圖〉；(2)〈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以順德本為題之專刊之介紹文章，1999年略為補訂；(3)〈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4)〈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

14 林先生指出，被諺稱為「黑老虎」的碑帖拓本，向來是造假的理想對象，造假手法層出不窮，林先生與「黑老虎」搏鬥有年，遂以「康熙伏虎」為題，發表〈康熙伏虎：中國藝術史研究方法舉隅兩例〉一文，簡介華山廟碑各拓本之來歷及其辨析過程與技巧，載《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2013年第2期，<http://cloud.itsc.cuhk.edu.hk/enewsasp/app/article-details.aspx/3839818E3F82336DB4C9BB892758B003/> 瀏覽日期：2015年12月11日。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的四大拓本中，順德本捶拓年份最早，是宋紙宋墨，長垣本次之，華陰本再次之，而四明本最晚，這是從四本缺泐字數之多寡而看出來的。<sup>15</sup> 順德本所缺二頁96字，是拓本冊頁之遺失所致，而非捶拓時原碑之缺泐所致。

順德本最早可考的藏家似為金農，但金農本人在順德本內並無任何文字題記，他目前存世的著述中也無隻言片語證明自己擁有此拓本，只有金農的朱文長方印「金氏冬心齋印」，鈐蓋於順德本首頁碑額「華」字右側。<sup>16</sup> 既然如此，為何歷來大家都認接受「金農是目前可考的順德本最早藏家」之說、似有毋庸置疑之意？即使林業強先生似亦未對此問題作系統性之闡述。原因大概是證據不足，大家姑且接受而已。茲展開討論。

「金農是目前可考的順德本最早藏家」之說，證據有二：第一、金農推崇華山廟碑書法，有詩句曰「華山片石是吾師」，金農目前存世的雙鉤本及摹寫本甚多，證明他擁有、或至少有辦法接觸到順德本。第二，順德本拓本內最早的題記是孫星衍的題記，孫說：「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金壽門圖書」，張古餘道光元年（1821）的題記中，也說這拓本是「馬氏玲瓏山館舊物也」，拓本內也有馬氏印鑒，馬氏就是十八世紀著名的揚州鹽商馬曰瑄馬曰璐兄弟，馬氏與金農同時同地而過從甚密。馬氏有文化有錢財，金農有文化而常缺錢財，因此金農可能「把華山廟碑（拓本）讓了給馬曰璐」。<sup>17</sup> 李棫先生在1963年為順德本題跋時，也推測是金農典當順德本予馬氏兄弟：

原闕二葉，殆由冬心齋付小玲瓏山館時，并明季清初題跋抽出，欲為他日必贖之地；冬心在雙鉤本附記嘗隱約言之；獨惜後來終未作延津之合。寶物忌全，果如是耶。<sup>18</sup>

林業強先生不表同意，他指出，迄今為止，找不到金農雙鉤本附記中的相關記載。<sup>19</sup> 無論如何，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史料確實證明金農擁有順德本在先、典賣予馬氏兄弟在後，我們何嘗不能推測是馬氏兄弟擁有順德本在先、賣予金農在後呢？因此，最保險的結論，應該是林業強先生這句話：「（順德本）伍詒堂之後的流傳經過很清楚，但早期的情況則很難考證」。<sup>20</sup> 不過，林先生也接受金農為順德本最早藏家這個論點。另外，林先生最初發表於1977年的〈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一文，於圖六的「四本歷代流傳表」中，在順德本藏家金農之前，還寫上

15 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這是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以順德本為題之專刊之介紹文章，1999年略為補訂，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86。

16 見〈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18。

17 錫珍，〈金農與西嶽華山廟碑〉，香港《大公報》藝林版，1966年1月30日，轉引自林業強，〈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86。

18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64。

19 〈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35。

20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

「范氏」二字，<sup>21</sup> 林先生指出，順德本每頁均鈐蓋騎縫印，是白文二字放印，第一字為「范」，考慮到順德本進入金農手上之前已經剪裝成冊，可以推測這范姓的騎縫印主人就是金農之前擁有順德本的人，但缺乏史料，無法進一步考證范氏的身份。<sup>22</sup> 田中有1982年參考林先生該文而撰寫有關華山廟碑順德本的文章，轉錄了林先生「四本歷代流傳表」，但在順德本這一欄中，就刪去「范氏」，以金農為最早藏家。<sup>23</sup> 這是不甚妥當的。

總之，順德本早期的存傳情形，難以考證。目前的共識是：順德本清朝之最早藏家為金農，其次為揚州馬氏兄弟。這個共識雖缺乏明確的史料證據，本文也姑且接受之，畢竟本文也拿找不出任何新證據。

另外，不得不交代一下金農雙鈎本這隻「黑老虎」的「肆虐」情形及其「伏虎」運動之展開。金農應該是在康熙年間得此拓本，但隱蔽之珍藏之，只以雙鈎本示人，他人又將金氏雙鈎本輾轉摹寫，目前所見至少有11個版本，流傳廣、附會多，牽涉到翁方綱等金石學大家。直至清末，對於金氏雙鈎本的「伏虎」運動才開始。首先，同治甲戌（1874），李文田把兩年前買到、日後被稱為順德本的拓本重新裝裱，詳加分析，發現碑文「《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的「傳」字缺了右下方的「寸」字，翁方綱由於未見金農拓本，又以為金農雙鈎本依據的是長垣本，而華陰、四明本缺泐之處恰巧包括這「傳」字，於是以為金農雙鈎本寫錯了「傳」字。李文田指出了翁方綱這個誤會，並指出金農雙鈎本就是來自其本人所藏之拓本而非長垣本。其次，光緒壬辰（1892），趙烈文在無法親眼看到金農藏拓本即順德本的局限下，仍然通過對於各拓本之分析，論證出金農雙鈎本並非長垣本。不過，針對金農雙鈎本的「伏虎」運動，集大成而收全功者，當然非林業強先生莫屬。<sup>24</sup>

順德本在十九世紀後的流傳情形，就很清楚了。道光元年（1821）「三月望後」，張古餘因官差而抵達揚州，用「緡錢十五萬」，從伍福（詒堂）手上收購了這個「馬氏玲瓏山館舊物」，此題記寫於三月廿九日，可見這筆交易完成於道光元年三月十五日至廿九日間（1821年4月16日至4月30日間）。<sup>25</sup> 「緡錢十五萬」究竟是多少？假設「緡錢十五萬」是指銅錢15萬文，據彭信威的估算，道光元年大抵相當白銀一百五十兩。<sup>26</sup>

21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92。

22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101。

23 田中有，〈小玲瓏山館本西嶽華山廟碑簡介〉，《書品》，267號（東京，1982），頁4。又，田中有於該文頁6引述馬子雲先生1961年發表於《文物》之文章時，誤作「一九一六年」。

24 見〈華山廟碑雜考之一：金農與順德本〉，《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17-150；有關李文田之考證，見該書之順德本拓本原文影印部分，無頁碼；有關趙烈文之考證，見該書頁124、128。

25 張古餘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

2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版），頁831：「清初白銀一兩易制錢七八百文。嘉慶年間可以換到一千多文，道光咸豐年間，有換到二千文的」，亦可參考頁831-832的「清代制錢市價表（二）」，其中顯示，道光八年，蘇松地區白銀1兩兌換制錢1,300文。

五十多年後，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1873年1月28日），李文田擔任江西學政期間，「張氏後人有在江右者出此碑求售，余（李文田）遂出俸銀三百收之」。<sup>27</sup>李文田籍貫為廣東廣州府順德縣，這也就是順德本得名之由來。李文田的題簽說：「同治十一年，得之南昌，十二年，重治之」，可見李文田是在南昌買此拓本的，但張古餘後人是誰、如何邂逅李文田等，李文田都沒有進一步交代。李文田個人詩文著述，也無一字道及之，<sup>28</sup>甚令人感到奇怪。無論如何，李文田買到此拓本後，重新裝裱，詳加考析，茲點列之：

- (1) 由於此拓本脫漏二頁96字，李文田請當時正好在江西任職縣令的金石書法名家趙之謙以雙鈎方式「鈎補缺頁，以成全文」。
- (2) 拓本內有嚴可均短短一行題記：「嘉慶甲戌（1814）冬，烏程嚴可均借觀，其明年（1815）秋，可均又借觀」。趙之謙提醒李文田，說嚴《鐵橋漫稿》卷八有針對該拓本而寫的長篇跋語，李文田請趙之謙抄錄之，放在孫星衍題記之左。李文田自己再於趙抄嚴跋之左，低二格寫一題記，解釋原委，時為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十月。
- (3) 就在趙抄嚴跋語這一頁的最左側，李文田又於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八日（1874年6月21日）寫一稍長的題記，抄錄吳玉搢《金石存》，進一步說明順德本早期藏家為金農、脫漏兩頁非始於金農、此拓本在孫星衍之前的跋語均於馬氏時佚去等問題。換言之這一頁內有李文田題記兩則。趙之謙在另頁寫一題記，李文田也於其下再寫一題記。
- (4) 李文田自己在同治十三年（1874）下半年展開順德本與三拓本的校對分析：李文田八月離開北京前夕，在吏部尚書崇綸家中借得四明本；同年十月十五日，抵達杭州，在梁恭辰（敬叔）處借得華陰本；同月廿四日，在嚴州府宗源瀚（湘文）處借得長垣本。李文田這三個月的校對分析工作，體現為他自己用蠅頭小楷在拓本各頁上寫下的合共38則校記。<sup>29</sup>

由此可知，李文田於1873年初買到順德本之後，重新裝裱之，請趙之謙雙鈎補回遺漏的兩頁96字，又請趙之謙抄錄原載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的題記，李文田自己寫下三則題記，後來，李文田將其順德本比對四明、華陰、長垣本，寫下38則校記，再加上封面題簽一則，合共42則文字，裝裱工作完成於同治十二年（1873），考證分析工作則完成於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末。

27 李文田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

28 李文田著述存世者頗多，但主要以蒙元史考證為主，真正個人著述，只有他逝世三十年後、門人徐珂編纂的詩集，薄薄四頁，完全沒有提及自己收購順德本之事。見李文田著、徐珂編，《李文誠公遺詩》，1925年刊，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27冊，總頁235-236。

29 李文田題記及各校記，俱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順德本目前最早的題記文字，是「北平周學和」的題簽，此題簽無年份，但李棫先生認為出於明代，見其1963年2月跋，《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64。

### 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內之孫星衍題記

由於順德本內有孫星衍題記一則，孫星衍名聲很大，李文田甚為珍惜之。但孫之題記本身並無日期，施安昌認為孫星衍跋語題於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sup>30</sup> 但未有提出任何證據，有可能是因為孫題記左側嚴可均嘉慶甲戌冬的觀款而產生誤會。林業強先生對此問題亦未有進一步說明，本節遂作一番推敲云。孫星衍題記全文如下：

此馬氏玲瓏山館藏本，有宋牧仲、金壽門圖書，詒堂得於廣陵，真元拓也。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并此而四，足為希世之寶。巴慰祖作偽亂真，識者勿惑之。孫星衍記。<sup>31</sup>

遍查孫星衍著述《孫淵如先生全集》，未見相關記載。但由於孫逝世於嘉慶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1818年2月16日），<sup>32</sup> 則此題記不可能晚於此日期，換言之，我們已經得知該題記之下限。但是，能夠考證出其上限嗎？可以，線索有三。

第一條線索，是孫星衍「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這句話。所謂「揚州阮氏」本，就是四明本，上文已指出，阮元自己說：四明本「（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歸于余」，<sup>33</sup> 但稍後又說：「（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歸于余」。<sup>34</sup> 究竟阮元是在1807年還是1808年得到四明本？<sup>35</sup> 另外，道光三年（1823）阮元自己刊行的《擘經室集》，收有〈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也說「十三年戊辰，歸于余」。<sup>36</sup> 換言之，阮元三度提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年份，一說1807年，兩說1808年。如何理解這個現象？由於缺乏史料證據，我們不便強作解人，但也許不是阮元記憶出錯這麼簡單，而是書畫碑帖之類的文物，從購入到重新裝裱面世，需要一段時間。正如李文田的順德本，論收購日期是同治十一年壬申除夕，論重治年份是同治十二年。總之，保險的觀點是：阮元在嘉慶十二年丁卯、十三年戊辰（1807-1808）年間得到四明本。孫星衍既然說「華廟碑惟有成邸所藏，及大興朱氏、揚州阮氏共三本」，可見此跋語一定不會早於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

30 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18。

31 孫星衍題記，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原書影印部分，無頁碼。林業強先生反覆查閱順德本全書，均找不到宋舉（牧仲）印章，懷疑是孫星衍把拓本首頁碑額「廟」字右方的「審三堂圖書印」的「審三」二字誤為「漫」字，而以為這就是字號「漫堂」的宋舉的圖章，見其〈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補說〉，載《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頁100。本文以為也許存在另一可能性：即宋舉的圖章可能鈐蓋於順德本脫漏的兩頁內。

32 張紹南編，王德福續編，《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19冊，總頁510。

33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1，頁16。

34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

35 考慮到本文用的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是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的排印標點本，筆者查閱該書原刊本即文選樓叢書內《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發現原文的確如此，見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載阮亨編，《文選樓叢書》，道光壬寅（1842）刊，卷1，頁21b，卷3，頁5a，收入嚴一萍《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第四四《文選樓叢書》第16函第140冊。

36 阮元，《擘經室集》，道光三年（1823）刊，第三集卷3，頁15a，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9冊，總頁218。

孫阮二人，稱兄道弟，於學術、詩文、金石方面均頗有交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阮元找到秦二世琅琊臺石刻，非常興奮，寫詩紀之，說要「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錢」即翁方綱、孫星衍、錢大昕三人；<sup>37</sup>翌年，孫星衍刊行其《問字堂集》，阮元寫長信恭賀之，自稱「弟」、「侍弟」，而稱孫為「兄」、「淵如仁兄年老前輩」；<sup>38</sup>阮聘孫到自己創辦的詒經精舍講學，孫亦撰〈詒經精舍題名碑記〉以紀其事；<sup>39</sup>嘉慶十一年（1806），阮元丁父憂，廬墓雷塘兩年多期間，孫又步翁方綱韻題詩贈阮元。<sup>40</sup>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這一年，孫星衍55歲，任山東督糧道，一度署山東布政使，足跡遍及直隸通州、山東濟南、濟寧、德州等地；<sup>41</sup>而阮元則44歲，在揚州丁父憂第二年，是年十月服闕入京，初任署理戶部右侍郎，旋調浙江巡撫，自嘉慶十三年戊辰三月起，於浙江巡撫任內堵截追剿海盜蔡牽、張阿治等。<sup>42</sup>阮元最早有可能在丁憂揚州期間或服闕入京途中把自己得到四明本的消息告訴了孫星衍。可惜，孫阮二人目前存世的著述中，都沒有他們就四明本問題切磋商榷的文字。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孫星衍如何知道阮元擁有四明本，可以確定的是：孫不可能早於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知道此事。如果還要進一步勉力推測的話，則阮元於嘉慶十四年（1809）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復攜元本至京師，<sup>43</sup>再過一年，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三月開始，至是年冬天，阮元的四明本陸續增加了13則題跋及觀款，包括阮元本人等25人。<sup>44</sup>也就是說，阮元擁有四明本的消息傳遍天下，更可能是1810年的事情，是年孫星衍仍任職山東督糧道，不但密邇京師，且更於四月押運漕糧北上，<sup>45</sup>如果孫星衍前此對阮元擁有四明本一事毫無知覺，到了這一年，應該也收到風聲了。

考證孫星衍題記日期的第二條線索，是「詒堂得於廣陵」一句，詒堂是伍福的字號，惜此人史料存世者極少，只知他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活躍於南京、揚州一帶的文化人兼文物商，1821年在揚州把順德本賣給張古餘的，就是伍福。孫星衍於嘉慶十六年（1811）因病辭去山東督糧道之官職，於是年重陽節前一天抵達南京，自此，除了嘉慶二十一年（1816）侍候父親赴京重赴鹿鳴

37 〈題秦二世琅琊臺石刻〉，《擘經室集》，第四集詩卷1，頁10b-11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9冊，總頁301-302。

38 〈問字堂集贈言〉，載《孫淵如先生全集》，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清嘉慶刻本，卷首，頁5b-7b，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77冊，總頁387。

39 載《平津館文集》，卷下，頁20a-25b，收入《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545-546。

40 孫星衍該詩，題為〈題阮中丞元雷塘表墓圖次翁閣學方綱韻〉，載《澄清堂稿》，卷上，頁11b-12a，收入《芳茂山人詩錄》卷2，收入《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588-589。

41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498-500。

42 張鑿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5-76。

43 四明本阮元題跋，載《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4。從該書卷1頁16-17可知，阮元授意其門生、長洲籍吳國寶摹刻二碑，立於阮元自己在揚州北湖的阮氏祠塾。

44 除阮元外，還有成親王、翁方綱、樹培、樹琨三父子、覺羅桂芳、桂萼兄弟、陳崇本、嚴可均、張鑑、陸繩、馬履泰、言朝標、朱文翰、朱鶴年、宋湘、張問陶、陳壽祺、屠倬、陳均、蔡之定、程荃、張岳崧、洪瑩、朱瀛，合共25人，見《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攷》，卷3，頁33-37。

45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505-506。

宴之外，一直在南京、揚州一帶活動，至1818年逝世為止。<sup>46</sup> 也許孫星衍就是在1811年之後，得伍福展示順德本，並獲邀題記。孫星衍與伍福確有過從，伍曾經請孫為一張畫題記。<sup>47</sup> 這樣，我們又不妨把孫星衍題記的年份的上限，推測為1811年。

考證孫星衍題記日期的第三條線索，是順德本孫星衍題記這一頁的「現場」佈局本身。這一頁合共有七則題記觀款，除孫之題記無年份外，其餘皆署年月，分別是：最左側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二十年（1815）嚴可均觀款，右側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姚鼐、伊秉綬觀款，右下方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吳脩觀款，最右側道光七年庚辰（1827）魏成憲觀款，左下方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胡嘉槐觀款。孫之題記佔據該頁中間，其餘六則題記，見縫插針，屈居左右及下方，假設李文田重新裝裱順德本時對此頁無大改動，除吳脩、魏成憲、胡嘉槐三人觀款書於孫星衍逝世之後而毋庸議論之外，嚴可均、姚鼐、伊秉綬必然是在孫星衍題記已經出現這一「歷史基礎」上找尋空隙，寫下題記，嚴、姚、伊三人題記，以嚴最早，時為嘉慶十九年。由此又可把孫星衍題記下限推測至1814年之前。

通過對以上三條線索的分析，及排比其他史料，筆者推測，孫星衍此題記的上限，應該是1807年即嘉慶十二年丁卯或以後，更可能是在1810年即嘉慶十五年庚午或以後，而其下限，應該是在1814年即嘉慶十九年甲戌或以前。

#### 四、總結

本文依靠林業強先生多年的紮實的研究，對華山廟碑四大拓本、尤其是順德本的來歷作一番梳理，又對順德本內沒有日期的孫星衍題記作一番考據，推測此題記寫於嘉慶十二年丁卯至十九年甲戌（1807-1814）之間。而對於李文田之後順德本的存傳情形，本文就不處理了。

李文田對順德本的重視及考訂之用功，是毋庸置疑的。但由於李文田已重新裝裱此拓本，此拓本仍在張古餘後人之手時的原貌，就難以辨認了。而古人於書畫冊頁上的題記，也往往隨意為之，有謙虛自持、遠隔多行、以小字敬書末尾者，有老實不客氣或情不自禁大書冊頁之內者，此外或署於天，或寫於地，見左側略滿則書於右側者有之，見右側已滿又復書於左側者之空隙者有之，再後來者則見縫插針，此外尚有原書頁面脫落、新頁增補挖改，題記位置移動等情形，總之鴻飛東西，雪泥斑斕，順德本內就充滿這些例子。可以說，順德本這類的碑帖冊頁，就像歷史本身，是層累地造成的。華陰縣的西嶽華山廟原址，和書桌上的《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一樣，都是歷史田野，都有待歷史考古工作之繼續進行。（2015年12月16日）

46 《孫淵如先生年譜》，清抄本，卷下，原書無頁碼，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9冊，總頁506-510。

47 孫星衍，〈伍怡堂索題南山圖乃王麓臺為其先世張太夫人作〉，收入《芳茂山人詩錄》，卷8，頁9b，載《孫淵如先生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總頁649。

###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獲收錄為 2015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獲收錄為2015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2015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錄名單如下：<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66>

### 洽蕙短期進修研究贊助金 (2016-2017年度)

洽蕙短期進修研究贊助金鼓勵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或教職員前往外地大學，進修與中國文化或中西文化交流等範疇，本年度的申請已於2016年1月8日截止，結果將於4月下旬於[中國文化研究所網頁](#)公佈。

### 第三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將於2016年5月19日至21日聯合舉辦第三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論壇旨在培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並增強青年學者之間的互動往來。

本屆論壇論文徵集已順利完成。論壇最新消息，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general/forum/>。

### 「中國文化教育班」招生

承蒙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慷慨資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將舉辦一系列「中國文化教育班」，藉以推廣中華文化。其中的「中國書法班」已於2015年11月開課，「國畫賞析班」及「歷史通識講座」將於2016年2月開課。更多課程包括「經典文化導讀班」、「崑曲班」以及「陶藝班」將陸續展開。最新課程消息，請瀏覽[中國文化研究所](#)網站。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

承蒙「利希慎訪問學者計劃」資助，已有三十三名來自海外及內地學者到訪中文大學。以下學者將於新學年到訪中文大學，並舉行研討會，最新消息請瀏覽[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頁。

學者	所屬院校	到訪日期
Kevin Joseph O'BRIEN	UC-Berkeley University	2016年1月2日至9日
Deborah Strong DAVIS	Yale University	2016年1月2日至11日
Sei Jeong Chin	Ewha Womans University	2016年1月3日至24日
孫沛東	復旦大學	2016年1月3日至31日
劉忠波	南開大學文學院	2016年1月24日至2月24日
賀照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2016年1月25日至2月24日
李文子	共識傳媒《領導者》雜誌	2016年3月1日至3月30日
趙德雷	哈爾濱工程大學	2016年3月1日至4月1日

2015 年第四次「午間雅聚」

## 解碼黑老虎：中大文物館藏碑帖菁華揭祕

何碧琪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何碧琪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地理，其後隨饒宗頤教授及莫家良教授於中文大學研究院藝術學部完成哲學碩士。2011 年於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完成博士論文《翁方綱與乾嘉時期碑帖書風及鑒藏文化》，師從傅申教授及王汎森教授，主修中國書法史及副修中國思想史，發表書畫、碑帖等學術論文二十餘篇。先後於中文大學文物館參與「宋拓《淳化閣帖》綜合研究」，編撰《祕閣皇風：〈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2003）、《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2015）藏品圖錄及籌畫相關展覽、研討會及講座。目前參與國家圖書館「中國珍貴典籍史話叢書」計畫，即將發表《淳化閣帖史話》專書。

2015年9月21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何碧琪博士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最近的研究成果及文物館於年底至2016年1月舉辦的碑帖展覽，演講主題為「解碼黑老虎：中大文物館藏碑帖菁華揭祕」。

何碧琪博士首先介紹，「黑老虎」指中國的拓本。拓本是用紙覆蓋在經過刻的石、木或鑄的青銅的表面，用刷等工具將紙擦入刻字或紋中，再用墨擦或撲於凸或平面之處，凹下去之處不上墨，而造成黑白的陰陽效果。拓本常有翻刻本，即使是古代的收藏家或文人，也難以區分拓本屬於原刻或翻刻，而其價值甚高，令人容易受騙，因此拓本常被比喻為「黑老虎」。何博士接著以顏真卿《麻姑仙壇記》為例，介紹如何解碼「黑老虎」，進而講解拓本的研究方法。

《麻姑仙壇記》傳世有大字本，中字本和小字本。小字本在明清時期流傳較廣，大字本流行於宋代及清末。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大字麻姑仙壇記》，而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小字麻姑仙壇記》即是《石渠寶笈》所提及的「唐搨」本。據《石渠寶笈》，乾隆皇帝根據此「唐搨」本至少臨摹過五次，此拓本的筆畫清晰，字形呈方形，上有乾隆的鑒藏印。按照前人說法，大字本及小字本均出自顏真卿手筆。何博士將《麻姑仙壇記》的大字本與多種小字本進行比較研究，通過比較去考查這一說法的真確性。



何博士稱文物館藏《麻姑仙壇記》大字本雖然不是原碑拓本，但其結字較古，字體開闊，筆力挺拔有力，很接近顏真卿的書法風格，故推斷此大字本是根據一方可靠的顏真卿書碑所翻刻的，年代下限是宋代。另外，文物館所藏《大字麻姑仙壇記》於清代曾經先後由蘇州著名收藏家陸恭及書法家何紹基所收藏，何氏的書法也是學自顏真卿。可知此版本在清代中期已經馳可當世，影響當時書風發展，因此，文物館所藏這一版本很有代表性。

從古代記載來看，《小字本麻姑仙壇記》很多時候也被認為是出自顏真卿手筆，如歐陽修初疑後亦認為是真刻，只有少數學者如黃庭堅、金石學家趙明誠等認為非顏氏所書。在小字本上，何博士選取了今傳之「南城本」（即文獻述及的「真建昌原本」），「晉唐小楷本」及「停雲館本」，與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大字本做比較。這些小字本之間是有直接傳承關係——「南城本」是「晉唐小楷本」的母本，而停雲館本則源自「晉唐小楷本」。這樣的傳承關係，是很多刻本及重刻本發展脈絡的寫照，不少宋代原刻，到了明清再被翻刻，所以，到了明清兩代拓本版本紛陳，關係錯綜複雜，千絲萬縷，要釐清原刻與翻刻及版本之間的關係尤為困難。

有見及此，何博士提出在拓本的研究方法上，可借用生物學「親緣關係」或「系統演化」譜系樹（phylogenetic tree）的概念，具體方法是以不同版本逐行逐字地仔細比較，找出

各版本的相同與不同之處，並分組歸類；重複校對不同版本後，便能分辨各版本的特徵，從而整理彼此間的演化關係。擁有一系列相同特徵的版本同屬一「譜系關係樹」，它們演化自同一祖本。除去相異特徵後，各本相同之處其實便是祖本的特徵。

何博士採用這研究方法，將文物館藏《大字本麻姑仙壇記》與「南城本」、「晉唐小楷本」、「停雲館本」《小字本麻姑仙壇記》的各種版本進行分析，仔細比對各版本在結字、疊字處理、避諱及格式上的相同與差異之處。對比後發現，大字本與小字本關係疏離。大字本及小字本明顯差異至少十七處，結字、疊字處理等有顯著不同，可推斷小字本非由大字本縮小而成。在避諱方面，小字本未避諱唐太宗的名字，「蒙 召」之間未空一字位表示尊敬，可見小字本應是北宋初（約10世紀）以後才出現。何博士由此判定《小字本麻姑仙壇記》非出自顏真卿手筆，此說法獲宋代趙明誠，明代豐坊、清代孫承澤（1592-1676）、顧炎武（1613-1682）、何紹基等首肯。再逐字仔細比對小字本各個版本的特徵，亦可以看到「南城本」為較早的版本，「晉唐小楷本」與「停雲館本」則是後來的翻刻，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徵。至於台北故宮所藏的「唐搨」本《小字本麻姑仙壇記》，相對「晉唐小楷本」等更近於「南城本」，但有不少經修改處，「唐搨」本的某些特徵是因為母本殘損而誤刻所致。此外，「唐搨」與大字本並非來自同一源頭，而現存早期小字本均可溯源於「南城本」。歸納上述結果，何博士推斷乾隆皇帝所推崇的「唐搨」本，只是據漶漫的「南城斷本晚拓」修繕刻成，並非唐搨，而是明中後期翻刻本。

總結而言，通過逐行逐字校勘，借用生物學「親緣關係」或譜系樹的概念，足以釐清《小字本麻姑仙壇記》非顏真卿真蹟的身份及其刻拓年代等疑團，亦有助澄清乾隆皇帝的小楷非來源於顏真卿真蹟。由此可見，法帖、碑版、拓本版本之於書法史研究，猶如文獻版本學之於歷史研究一樣重要。即使是後世判斷為可疑版本或偽蹟，亦可能曾對某些書家有過影響，其價值未宜一概抹煞。

何博士在最後介紹了文物館於2015年10月舉辦的「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展品分為北山十寶、游相蘭亭、豐碑古韻、法帖流風、銘記平生五個部分，其中八件拓本獲列入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這是首次有香港收藏的古籍拓本入選。

2015年第五次「午間雅聚」

## 呂壽琨與現代中國藝術

姚進莊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署理館長、藝術系副教授（禮任）

姚進莊教授現任文物館署理館長。他在芝加哥大學取得藝術史學士學位後，於牛津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由2006至2013年，他在西雅圖博物館任中國藝術部主任。作為一位明清至近現代的中國藝術學者，他的著作包括：*Writing Modern Chinese Art: Historiographic Explorations*（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9）及蓋蒂基金會贊助在線圖錄 *Remembering Days Gone By: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Seattle Art Museum Collection*。他曾任教及演講於多間大學，包括華盛頓大學及西雅圖大學。

2015年10月26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最近的研究成果，演講主題為「呂壽琨與現代中國藝術」。

姚進莊教授首先介紹呂壽琨的生平及其創作。呂壽琨1919年生於廣州，22歲開始作畫，24歲獲得經濟學本科學位。1948年，28歲的呂壽琨隨全家移民到香港，並在油麻地小輪公司工作，直到1966年。1954年呂壽琨在香港舉辦了首個個人畫展，1956年出版其重要著作《國畫的研究》。50年代末期呂壽琨以香港山水為主題，進行大量寫生。1960年他在斯坦福舉辦個人展覽，隨後陸續在國外舉辦多個展覽。呂壽琨過世時年僅56歲。在他過世後，香港陸續為他舉辦了多個紀念展覽，香港中文大學亦在2013年為呂壽琨舉辦畫展。

姚教授觀察到呂壽琨生前常有機會在國外舉辦展覽，說明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受到外國藝評家的肯定。但在其過世後，紀念呂壽琨的展覽多是在香港本土舉辦。姚教授考慮這也許說明呂壽琨的藝術尚未獲得清晰的評價，並進一步考察藝術史領域對呂壽琨的評價。他以 *Art of Modern China* 一書為例，指出書中對現代中國藝術史的敘述基本遵循中國大陸的主要歷史事件劃分中國藝術的不同發展階段，香港及台灣的藝術則需另立章節說明。姚教授認為這一框架很難對香港及台灣的藝術情況有細緻描述。另一書《20世紀中國藝術史》對香港藝術及呂壽琨的



評價是：「所有影響像風一樣吹過，多多少少也（在香港）留下一些痕跡」；「（呂壽琨）對古人的臨摹是混亂的，題材包括山水、花鳥、魚蟲、而手法卻兼工筆和寫意。這樣的教養不符合傳統」。姚教授認為這樣的評價突顯呂壽琨在國內外藝術史中受到忽視，並認為這樣的評價有失公允。

姚教授接著講述呂壽琨的創作及其藝術追求，討論呂壽琨對香港藝術乃至中國藝術的貢獻及影響。姚教授以呂壽琨1961年的一幅寫生作品《昂船洲》為例，指出這幅寫生採用簡潔的線條勾勒山水，突破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框架。相比之下，吳冠中直至1980年在《武夷山》這幅寫生中才出現類似的創作嘗試，可見呂壽琨對傳統國畫的創新嘗試起步非常早。

對於「（呂壽琨）對古人的臨摹是混亂的」這一說法，姚教授認為，呂壽琨對臨摹古人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呂壽琨說過，「水墨畫要教的是全面整體性的繪畫，再不是山水花鳥人物中某一個人的山水，花鳥或人物畫的八股形式。在臨摹中，目的何往？傳移甚麼？臨一張畫，有如拆開一幅牆，再由一個一個磚砌成一幅牆」。呂壽琨的臨摹在學習古人之餘，更帶著革新的目標。姚教授以呂壽琨臨摹高房山（高克恭，元朝畫家）的一幅畫為例，呂壽琨除了學習高房山處理霧氣的手法之外，更將其手法，構圖及筆墨應用於自己的寫生創作中，進行創新。另一幅呂壽琨臨摹元代四大畫家之一吳鎮的《漁父圖》，呂壽琨的臨摹沒有亦步亦趨，而是僅僅採用了吳鎮的基本構圖及圖畫中的基本元素，從而呈現不一樣的風格。後來呂壽琨也將臨摹吳鎮作品所學到的寫生方法用於自己的實地寫生創作中，進行創新。呂壽琨正是通過臨摹古代大師的畫作，學習他們的構圖，筆墨和設計，再進行自己的創作，在學習的同時脫胎於古人的傳統，開闢自己的創作之路。

呂壽琨在臨摹與創作之間經歷很多艱難的磨練，對於如何學習並掌握傳統的作畫方法，並走出臨摹的限制，開創自己的創新之路，呂壽琨有很深刻的體會。他認為：「學古人得其形便沾沾自喜者是蠢才；以為古人寫盡一切，所有神奇工巧，似已為古人所用盡，今無可變易者，是奴才」。同時他又指出，「藝術貴乎創造，祇有創造才新。但最新的，多源出於最舊，最底限度必曾受舊的影響」。他在新與舊，臨摹與創作，傳統與創新之間作出很多深刻的思考。

呂壽琨後來的創作更呈現抽象的風格。呂壽琨的山水寫生傳達著「可見」和「可感」兩個部分，這也是他在傳統山水畫的基礎上所作的創新。呂壽琨將這一思維用於其它題材，創作出後來著名的禪畫。他在50-70年代寫生創作時，與嶺南派的主張並不相同，他不認為嶺南派的細緻寫實為寫生的唯一方法，而是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對於自己的創作思路，呂壽琨說過：「自由者，是不受他人規限中，自己必須對自己有所規限，而非毫無規限也。隨意並非隨便……故好讀書才可以不求甚解；極端嚴肅的才會難得糊塗所謂大膽落筆，並不是胡亂寫作……必須多讀，多寫，多作，多有古人遺墨，多看自然之瞬息變幻，才會大膽落筆」。他認為，大膽的創新是建立在紮實的傳統作畫功夫之上。

呂壽琨對於香港及中國藝術的發展有很精確的預言。他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中說過，「香港水墨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劃下一度鴻溝，在藝術立場上，證見水墨開出造形與抽象兩條大道，將中國繪畫有史以來一貫的自然現實表現形式，另闢新徑。這是水墨畫必成為將來中國繪畫主流的重要主因」。過去幾年繪畫界的發展恰恰印證了呂壽琨四十多年前的預言。

中國當代藝術始終面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抉擇與融合問題。呂壽琨很早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嘗試和思考。在深入接觸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後，他更體會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特長，並認為中國傳統藝術能為西方藝術提供很好的借鑒。他認為，「國畫之氣韻，剛巧就是今日世界摩登藝術所要求達到之三原則的總和：思想之傳播，感覺的表現，瞭解的接觸。而以哲學文化為基礎，國畫祇論氣韻而不言美。實在是藝術上的至高表現。西洋畫系要等到廿世紀才確定藝術不一定美」。姚教授認為這一觀點彰顯呂壽琨對中西藝術的獨特理解。最後，姚教授亦借用呂壽琨對香港水墨畫的總結，回應西方及中國大陸藝評家對香港藝術的評價，「（水墨畫在香港）已成為中國繪畫的代表與主流……但，並不等於中國大陸或台灣亦承認其代表性」。姚教授認為，隨着學術界對呂壽琨及其他香港畫家的研究逐步深入，二十世紀的中國藝術史將呈現新的面貌。

2015 年第六次「午間雅聚」

## 古代的詩歌節律與四六文的韻律機制

馮勝利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馮教授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語言學系，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及哈佛大學任教語言和文化十五年。2010 年加入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訓詁學、歷史句法學、韻律句法學和韻律詩體學。出版學術著作有《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漢語韻律句法學》、《漢語韻律語法研究》、《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 等等；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2015年11月30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馮勝利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最近的研究成果，演講主題為「古代的詩歌節律與四六文的韻律機制」。

馮勝利教授首先說明，作為語言學研究者，他將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詩歌和駢文。馮教授指出，西方語言學無可否認對現代語言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但接受了中國語言文學系培養的學者，往往更關注中國語言與文學本身的一些獨特問題。在中國詩歌史上，最早出現的是二言詩。問題是為什麼四言詩發展起來以後，二言詩便消失了？為什麼先有四言詩（《詩經》）而後有三言詩（《郊祀歌》）？為什麼三言詩之後才有五言詩？為什麼五言詩產生後，三言詩反倒衰落了？五言詩以後為什麼沒有六言詩？六言體運用最廣的為什麼是漢賦和駢文？從語言學角度，言即字，字即音節。何以中國詩歌的音節呈現上述發展進程？馮教授認為，這是中國幾千年詩歌發展中值得去探討和研究的問題。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開端或解釋。

馮教授先從詩歌誦讀的問題談起。他以「鋤禾日當午」這首五言詩為例，五言詩似乎可以誦讀為三拍（鋤禾#日當#午），也可以誦讀為兩拍（鋤禾#日當|午）。七言詩似乎亦可誦讀為

三拍（一片|飛花#減卻|春）或四拍（一片#飛花#減卻#春）。從語言學的角度，兩種誦讀方法體現了兩種節律結構。「一片#飛花#減卻#春」是「二二二一」的節律結構，「一片|飛花#減卻|春」的讀法則變成了四三的兩節結構。



馮教授接著討論哪一種誦讀方法更加符合古人的語感。五言詩是漢代末期出現，七言詩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盛行於唐朝。清朝皇族后裔，著名古典文學專家

啟功先生曾記錄中國詩歌的節律和吟誦方法。根據《啟功全集·第一卷》的記錄：四言詩應誦讀為兩節，六言文如「儼驂駟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一樣誦讀為兩節，每一節的開頭一個字不算拍。第一節開頭的字為節外拍（即英文所稱extrametricality/anacrusis），第二節的頭一個字為「間拍」（拍與拍之間的襯字）。還有，七言句「爽籟發而清風生」讀作兩拍，中間的「而」字不算拍。而另一首七言句「落霞與孤鶩齊飛」讀作三拍，中間的「與」字同樣不算拍。這樣的誦讀規律告訴我們，字數不能作為劃分節拍的根據，詩歌的虛字常不算拍。有些不算拍的字為半起拍（如「帝高陽之苗裔兮」中的「帝」（即節外拍）。詩歌有自身的節律法。唐朝和尚遍照金剛在《文鏡秘府》中也談到詩歌的節律「兩句律」（句即停頓，節律單位）：「上二字為一句，下一字為一句：三言；上二字為一句，下二字為一句：四言；上二字為一句，下三字為一句：五言；上四字為一句，下三字為一句：七言」。遍照金剛認為，中國詩歌的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是誦讀為一行兩節，都是兩節。詩行以一行兩節（句）為佳。這是遍照金剛的詩歌語感，也反映出當時人們誦讀詩歌的節律法。這一節律法被後來當代著名學者及詩人林庚稱為「半逗律」，即前後各一節 / 一行兩節、兩個韻律單位：「將詩行劃分為相對均衡的上下兩個半段，從而在半行上，形成一個類似『逗』的節奏點」；「『半逗律』與不同的『節奏音組』（即『大音步』，比標準音節兩音節音步大的三音節音步）的配合，構成長度不同的典型詩行，而且『節奏音組』總是落在行尾位置上，它決定了詩行的特殊性」。（《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大音步總是落在詩歌行尾，這是詩行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的原因，至今仍是還未解決的問題。

對於中國詩歌節律的規律，馮教授進行了一些研究並發現詩行遵從自然音步，即誦讀時從左到右，兩字組成標準音步，最後奇數的字總是與前面的音步一起，形成一個三個音節的大音步。在音步組成以後，節律基本呈現三種規律，齊整律，懸差律及長短律，由此形成一個節律功能的完整體系。不同的節律形式表現不同的語用功能和風格，如齊正律表現的是雅正風格，

而懸差律則有俗諧的效果，這便是節律的語體意義。例如，懸差的節律常被運用於一種諧體詩一三句半，造成一種強烈的諧趣風格。

馮教授根據從以上規律總結中國詩歌的一些特徵。根據「半逗律」，詩行最低限度一行要兩個音步（韻律單位），因此，沒有一言詩，最起碼是二言詩。但是二言詩按照前面所提到的節律規則沒辦法誦讀，這暗示中國語言的節律規則在某個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也推翻了四言詩是由二言詩發展而來的簡單結論，因為兩者的節律規則並不相同。漢學家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 – 1991）就曾提出漢語曾在西周前後在節律類型上發生過重大變化，而二言詩正是產生在西周以前。

另外，詩歌與說話不同，詩歌有音樂性，有旋律，而旋律的本質在重複。因此，詩歌的根本因素在其音樂性和重複性，這是詩歌語言的形式特徵。詩歌的基本旋律便是齊正，提煉口語的節律而形成的整齊有序的話語形式，體現有規律的重複，呈現詩歌的節拍、押韻、平仄等。長短律則是根據口語中的自然節律而提煉成的話語形式，形成一種散文體的風格。懸差律則是根據語言輕重形式提煉而成的俗諧節律，更多的運用於諧俗體，造成諧趣效果。

馮教授在此基礎上繼續分析四六駢文。他指出駢文是詩和文的組合體，駢文不是散文，而是介乎散文與詩歌的語言形式之間。四六文為什麼不是四六詩？因為「詩律及文律具根本上的不同：詩律要求詩句以兩個韻律單位複迭組成，六言詩標準韻律有悖於此；文律則容許句內輕重、長短不一，使六言句內變化多端」（盧冠忠，2013）。

馮教授從節律角度總結漢語詩歌結構的最小條件（Minimality Condition）是單音不成步，單步不成行，單行不成詩。因此，詩歌最小的音步 = 兩個音節（two syllables），最小的詩行 = 兩個音步（two feet），最小的詩段 = 兩個詩行（two lines or a couplet），最小的詩節 = 兩個詩聯（a stanza, quatrain or 絕句）。這是漢語詩歌的基本節律結構。從這個角度看六言文，在誦讀的時候，若是兩字兩字形成三個音步，則不符合詩歌的「半逗律」，若是按照二四或者四二分節律，則節律懸差太大，不符合詩歌的齊整律，因此六言的詩感與五言、七言並不一樣。由此可以解釋六言詩歌並沒有在中國廣泛流傳的原因，因為六言形成的詩感並不強，而賦有很強的以長短律為基礎的詞感。從節律角度還可以解釋詩歌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許多其他現象，也為馮教授在講座最初提出的幾個問題提供一個解答的切入點。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2015年訪問學人公開講座

## 石之瑜教授：中華性，華人性，與後華性 ——比較東南亞的華人與中國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於2015年成立訪問學人計劃，邀請東亞地區著名學者到訪香港中文大學作學術交流。今年，中心邀得石之瑜教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2015訪問學人。石之瑜教授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大學講座教授，專長國際關係、中國研究及文化研究等領域。他的學術著作包括：*Po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Reconsidered: The Pre-modern Politics of Gongsun Long* (2015);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2014); *Sinic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Civi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Subaltern East Asia* (2013); *Civilization, Nation and Modernity in East Asia* (2013); *On China By India: From Civilization to Nation State* (2012); *Autonomy, Ethnicity and Pover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State Turned Upside Down* (2007),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2003)等等。

石教授於2015年10月13日主持公開講座，題為「中華性，華人性，與後華性：比較東南亞的華人與中國研究」。石教授分享了他其中一篇文章「中華再連結：從華人性到後華性」，文章摘要如下：

本文探討香港、台灣兩地在中華、後西方及西方框架下的困難定位。大陸化有潛力在全球自由主義框架之外重新界定香港與台灣，然諷刺的是，它同時消磨兩地本身特有的華人性。後華性身份認同由此而生。

一方面，同為前殖民地的香港和台灣均不滿中國國際關係無法贊同後西方這樣一種位置界定，並壓制後西方觀感。另一方面，兩地同時抵抗中國民族主義，並以各自的方式挪用自由主義，正正體現典型的後西方特質。大陸化最終折射出後華身份認同的過程，期間各方可隨時重拾共同的文化資源從而互相認同為中華想像共同體，實際上各方意識到的是自身獨特的華人性。



左：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2015訪問學人石之瑜教授；右：香港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

華人性在概念上容易讓人誤以為華人性僅僅關注世界華人群體之間的差異。華人社群之間確實各有差異，但還應該繼續關注這些差異本身。後華性正正指向這些差異本身，並把研究的目光轉向差異的相互關係，關注華人社群重新建立連結的機制。正因為每一個華人社群都是獨特的個體，因此使用了泛指的「後」（華）來界定。然而，華人社群得以重新連結的基礎恰恰來源於（儘管是想像中的）共同的文化資源。

後華議程的關鍵在於發現共同文化資源如何被引發。在有關社會及個人身上，引發共同文化資源的機制，過程和結果與其中內含的自由主義總是相互組構的關係。華人社群之間的關係與自由主義構成一種「雙議題」或「非合成的辯證關係」，並能發展出混合的、單獨的或是循環的議題。在這個意義上，後華性也具備後西方特質。台灣和香港自由機構的運行受到大陸化的影響，但不管是積極地還是消極地，大陸化必定針對自由主義做出自身調整，使得中國的話語、機構及政策可以促進香港和台灣的華人關係。

「嶺南城市文化研究計劃」系列講座（三）

## 張蔭桓與他的朋友圈



中國文化研究所邀得梁基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澳門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講師）於2015年11月16日主講嶺南城市文化研究計劃系列講座（三），主題為「張蔭桓與他的朋友圈」。梁博士在講座中介紹清末廣東名臣張蔭桓的一生及其與幾位重要清末官員的交往，展示一位清末官員在面對時代變遷所作出的個人抉擇及清末中國官場，特別是廣東官員的歷史面貌。



## 文物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開幕典禮

「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開幕典禮於2015年10月16日舉行，主禮嘉賓包括北山堂基金主席利乾先生、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中大文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署理所長黎志添教授、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傅申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員施安昌先生、中大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以及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何碧琪博士。

「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將分兩期展出合共七十件珍貴碑帖銘刻拓本，是繼中國書法及宜興紫砂後，文物館再一次推出北山堂藏品展覽及藏品圖錄系列。展覽費用全免，歡迎公眾參觀。



(左起) 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兼展覽策展人何碧琪博士、東京國立博物館企畫課長富田淳先生、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組長胡海帆先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施安昌先生、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署理所長黎志添教授、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前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席及中大文物館創館館長屈志仁教授、北山堂基金主席利乾先生、文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傅申教授以及中大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

## 文物館「碑帖銘刻拓本的研究價值、保護及收藏」公開講座

配合「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文物館於2015年10月17日舉辦「碑帖銘刻拓本的研究價值、保護及收藏」公開講座。講座反應熱烈，吸引了約百位參加者。

是次講座邀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屈志仁教授、臺灣大學傅申教授、北京故宮博物院施安昌先生、北京大學胡海帆先生及東京國立博物館富田淳先生，與中大藝術系莫家良教授、文物館何碧琪博士等學者交流及分享碑帖拓本的研究心得。各位講者精彩分享，參與者獲益良多。



## 文物館「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特別預展及開幕典禮

文物館於2015年10月30日舉辦「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特別預展及開幕典禮，主禮嘉賓包括「喜聞過齋」主人鄧國楨法官伉儷、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教授、中大文物館

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張尉教授、中大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及副館長許曉東教授。

「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展出一百零九件「喜聞過齋」所藏的中國玉器，歷時新石器時代至清晚期，主要為佩飾、人形和人像玉器及文房陳設雅玩，展覽將於11月28日起開放予公眾參觀。



(左起) 中大文物館副館長許曉東教授、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張尉教授、中大文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莫華釗先生、「喜聞過齋」主人鄧國楨法官伉儷、中大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教授、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以及中大文物館署理館長姚進莊教授主持剪綵儀式

##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



「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是漢語語言學學界的重要學術活動，一直以來主要在香港、澳門、廣東、廣西等地輪流舉行。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1987年於中大校園舉行，第十屆在2005年由中大主辦，為突顯第二十屆的重要性，研討會「重臨」中大。這次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香港語言學學會贊助，已於2015年12月11至12日召開。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比較語法」，通過比較的方法，尋找粵語的特點，從形式研究、歷時研究、跨範疇的接口研究等不同角度，探索粵語語法的特點。海內外從事粵語研究的專家學者及學生聚首一堂，切磋跟粵語語言學相關的問題。

##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銀禧系列活動

為慶祝《二十一世紀》創刊25周年，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一系列活動。2015年10月31日的晚宴得到編委楊振寧教授、金耀基教授、副校長張妙清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梁元生教授、副所長黎志添教授、助理所長余國良博士及多位身兼編委的中台學者如秦暉教授、錢永祥教授等蒞臨，共同表達對《二十一世紀》的支持。



此外，11月份亦舉辦了兩場大型演講會。首場演講會於11月2日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圓形廣場舉行，由錢永祥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與梁文道先生就題目「公共文化：哲學的實踐」展開對談，並由周保松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及《二十一世紀》編委）主持，參加人數達二百人，參加者踴躍提問，歷時兩小時半，至晚上七時結束。



第二場演講會11月30日於潤昌堂舉行，演講嘉賓為許紀霖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題目為「文化自覺還是文明自覺——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本所所長暨本中心主任梁元生教授主持，現場討論氣氛熱烈。

2015年11月12至14日，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與亞際書院合辦「六零年代的中國與美國」閉門學術會議。該會議由漢雅基金會贊助，於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行，以美國六零年代的反主流青年文化風潮與中國同時代的文化大革命並置討論，以開拓對於六零年代文化和政治研究的視野。兩天半的會議由本所助理副所長暨本中心副主任余國良博士與漢雅軒張頌仁先生共同主持。十多位學者發表論文，包括來自中國的賀照田教授、楊小彥教授、金大陸教授，及來自歐洲與俄國的Siegfried ZIELINSKI、Johan HARTLE、Michael OPPITZ、Boris GROYS等多位教授。

如欲重溫以上兩場大型演講的錄像，及知悉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最新活動，可透過以下途徑：

- 1) 中心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rcccc/event\\_main.html](http://www.cuhk.edu.hk/ics/rcccc/event_main.html)
- 2)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21c/>
- 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微博：<http://www.weibo.com/ics21c>



文物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何碧琪主編著，2015

利氏北山堂由1970年代至今捐贈文物館約共2090件拓本，是次藏品圖錄包括70件精品，當中20件是宋拓名品，例如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宋刻米芾《英光堂帖》（徐渭仁舊藏本）等。

文物館 東漢《夏承碑》、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何碧琪編撰，2015）

2015年適逢館藏八種碑帖被列於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文物館特選當中的隸、楷、草書三種拓本，包括東漢《夏承碑》、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及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刊行原大原色法帖，以饗讀者。拓本前附簡介、旁列釋文及後刊題跋、印章釋文，以備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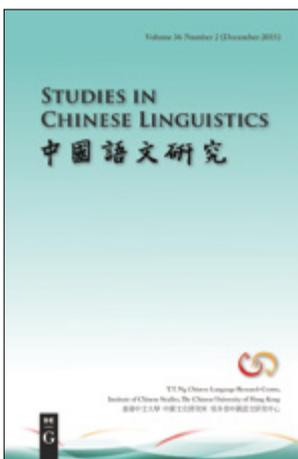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36 卷第 2 期

《中國語文研究》第36卷第2期已經出版。本期刊載三篇英文文章：

1. 福井直樹：〈人類語言的弱生成與強生成〉
2. 蔡承佑：〈論福井的評論〉
3. 蔡維天：〈漢語動詞二位現象的個案探討〉

文章可以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http://www.cuhk.edu.hk/ics/clrc/>。





###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一世紀》，2015年10月號及12月號

適逢《二十一世紀》創刊 25 周年，2015年10月號，第151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寫在創刊二十五周年之際」，編委許倬雲教授、張隆溪教授、李金銓教授、許紀霖教授及陳方正博士皆發表文章，回顧過去 25 年，《二十一世紀》與中國及世界的發展。

《二十一世紀》2015年10月號，第151期。刊載學術論文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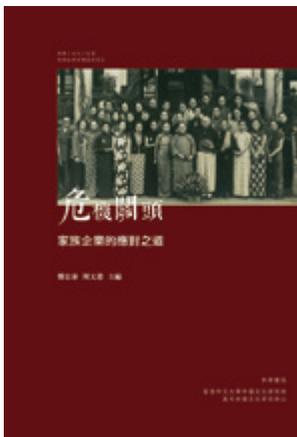
1. 秦暉：〈兩次啟蒙的切換與日本式自由主義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二）〉
2. 陳建華：〈「共和」的遺產——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
3. 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
4. 宋鑽友：〈戰後上海港的整治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復興計劃〉
5. 林鵬：〈弱者的命運：大饑荒期間南京地區的棄嬰現象〉



《二十一世紀》2015年12月號，第152期已經出版。「二十一世紀評論」之主題為「國家與資本擠壓下的勞工」，內刊王江松教授文章〈當代中國勞工政治〉，以及學術論文五篇：

1. 劉驥、熊彩、德新健：〈解釋中國人口政策的歷史分期：政治精英理念轉型的視角〉
2. 霍炫吉：〈大饑荒之後的緊急措施：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啟（1962–1966）〉
3. 趙亮：〈天災、匪亂抑或糧賦過重？——中共對1950年華東大區「搶糧」事件的探究〉
4. 陳建華：〈「共和」主體與私密文學——再論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
5. 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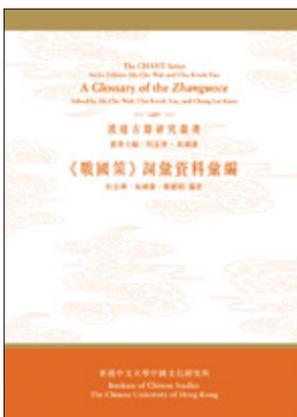
詳細目錄請見《二十一世紀》網站：<http://www.cuhk.edu.hk/ics/21c/>



###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危機關頭——家族企業的應對之道》，鄭宏泰、周文港主編，2015

《危機關頭——家族企業的應對之道》已於 2015 年 12 月出版。該書由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宏泰教授及名譽副研究員周文港博士主編，書中所收的九篇研究文章，分別以恒生銀行、東亞銀行、利豐集團、何東家族、台灣辜振甫家族、寶成集團、澳門的鄭觀應家族、盧九家族，以及英資怡和及太古洋行等多個家族和企業作個案，研究其在面對信任危機、傳承危機、戰略危機、組織架構危機、市場運作危機及財務危機的時候，所採取的應對之道，期望這些經驗能為華人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訂購請聯絡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戰國策〉詞彙資料彙編》，何志華、朱國藩、鄭麗娟合編，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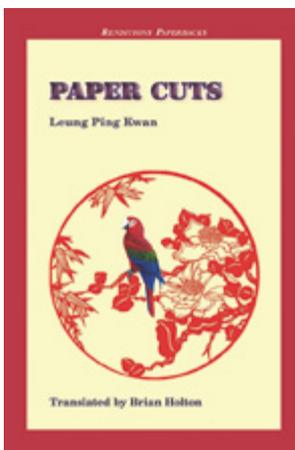
由何志華教授、朱國藩博士、鄭麗娟博士合編之《漢達古籍研究叢書》第三十八種《〈戰國策〉詞彙資料彙編》已於2015年12月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利用漢達文庫電腦檢索系統將詞彙輯錄，並統計不同數據，然後編纂《戰國策》之專用詞彙，及該書之詞彙僅見於單一先秦兩漢典籍之材料。該書將有助學者檢索先秦兩漢詞彙使用數據，並進一步探究先秦兩漢典籍語言特質，並據此開展更多歷時性、跨文獻之詞彙研究工作。

訂購請聯絡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或中文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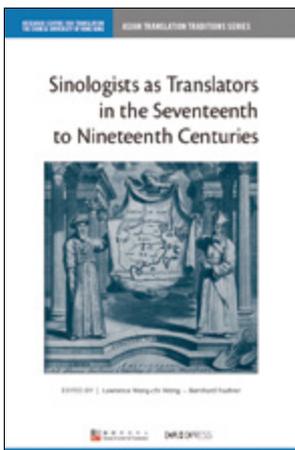
### 翻譯研究中心 *Renditions* no. 84

*Renditions* no. 84 is a general issue with a special section devoted to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Chi Pang-yuan's 齊邦媛 epic autobiography,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as expertly translated by John Balcom. Other features comprise one more chapter of Erik Honobe's fine rendering of Feng Menglong's 馮夢龍 seven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novel, *Chronicles of the Eastern Zhou Kingdoms*, together with excellent translations of two of the finest poets now writing in Chinese, Yu Jian 于堅 and Yang Mu 楊牧 (pen name of Wang Ching-hsien 王靖獻),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 翻譯研究中心 *Paper Cuts* By Leung Ping Kwan; Translated by Brian Holton

*Paper Cuts*, Leung Ping Kwan's (Ye Si) landmark work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first appeared in 1977 and has been much read and commented upon ever since. A novel that brings into being the dizzying topography of life in the fast-moving and ever-changing city, it features arresting meditations on the nature of subjectiv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media world, art and culture, and above all conveys a profound sense of the bewildering pace of change in the modern city. In a virtuoso translation by Brian Holton which does full justice to the rich style of the original, this book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Asian literature.



### 翻譯研究中心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Bernhard Fuehrer and Lawrence Wang-chi Wong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eleven papers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19th Centuries." With a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ntributions by early Sinologist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of works in Chinese, papers within this volume explore why certain works were chosen for translation, how they were interpreted, translated, or even manipulated, and the impact they made, especially in establishing the discipline of Sinology in various countries. This book aims to reconstruct a wider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from which certain translations emerged, and also to further expand the field through the extensive use of hitherto overlooked archive material so as to open up fresh avenues for research.

## ■ 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

中國文化研究所為中國文化研究學者提供定期及持續的交流機會，於學期間每月舉行「午間雅聚」，活動備有午膳招待、短講及分享環節，詳情如下：

日期	講者	講題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莫家良教授 藝術系	〈鄧爾雅的書法——從文物館藏品談起〉
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陳方正博士 中國文化研究所	〈西方世界觀的演變〉(暫定)
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黃宗儀教授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待 定

「午間雅聚」於下午12:30在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舉行。有關詳情，請瀏覽[中國文化研究所](#)網頁。

##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第十二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2016年1月6至9日)

為促進當代中國研究及中外年青學者結識、交流，提升中國研究博士學生的能力，拓展其視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及亞太漢學中心，於每年1月舉辦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讓當代中國學者發表論文及研討，並為與會者於會期前後到中心查閱文獻提供協助。

第十二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訂於2016年1月6至9日舉辦。詳情請見研討班網站：<http://gsoc.usc.cuhk.edu.hk/>。

■ 文物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1月31日)

利氏北山堂由1970年代至今捐贈本館約共2090件拓本，是次展覽包括七十件精品，當中二十件是宋拓名品，包括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宋刻米芾《英光堂帖》（徐渭仁舊藏本）等。

另外，碑帖收藏是北京及江南文人文化南移至廣東的重要里程碑，在北山堂碑帖收藏中，繼承自清代廣東著名收藏家的拓本有東漢《西嶽華山廟碑》（李文田舊藏本）、唐李邕《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本）、宋刻東晉王羲之《十七帖》（孔廣陶舊藏）、南宋理宗朝丞相游侶舊藏「游相蘭亭」十種（潘仕成海山仙館舊藏）等。這批藏品對於廣東及香港具有深層的文化意涵。

是次展覽精選展品如下：



東漢 西嶽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

額篆書，碑隸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13開半，題簽及題跋9開半，雙鉤補摹4開，墨紙各約25 × 17.6厘米，宋拓

東漢延熹八年(165)立

利榮森博士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73.0678



東漢 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

隸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21開，雙鉤補摹2開，題簽及題跋5開半  
墨紙各約26.4 × 14.6厘米，宋拓

原碑東漢建寧三年(170)立

北山堂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81.0126



唐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汪氏孝經堂本)

楷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18開，題簽及題跋6開

墨紙各約28.3 × 13.3厘米，宋拓

唐貞觀六年(632)立

北山堂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92.0024



宋刻 東晉 王羲之十七帖(孔氏嶽雪樓本)

草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17開半，題簽及題跋9開半

墨紙各約25.5 × 13厘米，宋拓

約原刻於貞觀年間(627-649)

北山堂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79.0018



甲之二 御府領字從山本蘭亭序

原為王羲之(約303-361)撰並書,東晉永和九年(353)

刻自南宋高宗(1127-1162在位)臨本

行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3開半,題跋半開

墨紙各約26.2 × 12.5厘米,南宋理宗朝或之前(約12世紀)

利榮森博士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73.0618



甲之五 御府本蘭亭序

原為王羲之(約303-361)撰並書,東晉

永和九年(353)

刻自南宋高宗(1127-1162在位)臨本

行書,墨拓紙本,冊頁,拓本3開半

墨紙各約25.8 × 12.6厘米,南宋理宗朝

或之前(約12世紀)

利榮森博士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藏品

1973.0619



宋刻 淳化閣帖 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

行草,墨拓紙本,冊頁,拓本34開,題簽及題跋6開

墨紙每頁約25 × 13.6厘米,宋拓

原刻於宋淳化三年(992)

北山堂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

1988.0033

蘭亭圖(益定王重刻本)

行書及線刻畫,墨拓紙本

全長1651.6厘米(其中墨紙1545.6 × 33.2厘米,引

首106 × 33.2厘米),約刻拓於明萬曆四十四年

(1616),手卷,明拓

北山堂惠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94.0063



展期:(第一期)2015年10月17日至11月29日

(第二期)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1月31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I

文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休館

■ 文物館「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2015年11月28至2016年2月28日)

是次展覽呈現「喜聞過齋」一百零九件藏玉，歷時新石器時代至清晚期，以佩飾、人形/像玉器及文房陳設雅玩為特色，展示數千年來集天地自然精華的礦物「玉」與社會生活主體的「人」之間的彼此互動，詮釋其在宗教信仰、社會價值及個人情懷方面的功能與角色。展陳將玉器與藏家的明清傢俱、書畫收藏融為一體，意在營造傳統文人置身書齋，品古養性，景物兩宜的情境。

是次展覽精選展品如下：



六節半人面紋玉琮  
新石器時代 良渚文化  
高：21.3厘米  
闊：6厘米 × 6.5厘米(頂)  
5.8厘米 × 5.8厘米(底)



蹲踞人形飾  
商代中晚期 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紀  
高：7.4厘米 闊：3.7厘米  
厚：1.6厘米



玉弧形高冠鳥飾  
商代中晚期 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紀  
高：10.2厘米 闊：3.5厘米  
厚：0.6厘米



玉舞人佩  
戰國晚期 公元前三世紀  
高：8.3厘米 闊：3.1厘米  
厚：0.45厘米



透雕踏雲龍佩  
唐或遼 九至十世紀  
長：8.3厘米 高：4.8厘米  
厚：0.3厘米



玉天鵝形佩盒  
遼 十世紀  
長：8.4厘米 高：5.2厘米  
厚：2.6厘米



龍紋瓣口盤  
遼 十一世紀  
直徑：15.5厘米(口)  
12.8厘米(底)  
高：1.4厘米 厚：0.2厘米



玉「踏雪尋梅」圓雕擺飾  
清乾隆 十八世紀  
長：10.7厘米 高：6.7厘米  
厚：3.4厘米

展覽日期：由2015年11月28至2016年2月28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II

文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休館

■ 文物館「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2015年11月28日至2016年2月28日)

承蒙北京故宮博物院惠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將從故宮超過四百餘件相關藏品中，借展四十件印度莫臥兒王朝玉器精品來港展出。這是香港乃至內地的第一個相關的專題展覽，絕大部分展品從未展出或出版。展覽旨在揭示莫臥兒王朝玉器藝術的成就、其與中國玉雕藝術的相互影響及清代仿莫臥兒王朝玉器的辨析。

展覽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友會傾情贊助，精選展品包括：



透雕花葉紋碗  
印度，18晚期-19世紀早期  
高10.3厘米  
口徑17.2厘米  
足徑8.5厘米



花卉紋花蕾耳罐  
印度，17-18世紀早期  
高7.9厘米  
口徑6.7厘米  
足徑5.9厘米



莫荖葉紋墨瓶筆室  
印度，17-18世紀  
墨瓶高8.5厘米  
長22厘米  
口徑2.7厘米  
筆室口徑1.9厘米



鑲金嵌玉石執壺  
印度，18世紀  
高25厘米  
口徑6.7厘米  
足徑7.2厘米



鑲金銀嵌紅石長頸瓶  
印度，18世紀  
高20.3厘米  
口徑1.7厘米  
底徑4.5厘米



莫荖葉紋燭台  
印度，18世紀  
高42.9厘米  
盤徑29厘米

展覽日期：由2015年11月28日至2016年2月28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II

文物館開放時間：星期一、二、三、五及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四休館

編輯委員會

主編：黎志添

成員：徐艷蓮 梁子煒 李潔兒